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 “中国智慧”^{*}

徐淑丽

(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解中国革命进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遇到政治和理论危机后更是积极从中国寻求理论资源与实践支持。在构建和发展本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反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紧密联系群众的人民观、主张平等互鉴的文化观进行了书写和借鉴。他们的书写在本质上是以“中国智慧”来反观英国文化与社会,在客观上向西方民众展现出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对中国文化与理念“走出去”并“走进来”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42(2023)03—0121—05

DOI:10.13392/j.cnki.zgqd.2023.03.021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理论危机使他们更为注重从中国革命及建设理论中寻求解决本国社会问题的良方。他们主要从文化视角观察中国,在构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经常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汲取智慧来反观英国文化与社会,从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年来在中国所受关注日增,但他们对“中国智慧”的书写与吸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哲学观、文化观和人民观的书写与借鉴入手,剖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借助中国智慧、以“中国视角”透视英国文化与社会问题并进行的文化理论创新,从而管窥中国文化的西行“密码”。

一、哲学观:反二元对立

如何处理城乡关系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中国的重要视角。中国“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使得英国学者看到了弥合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断裂的可能性。20世纪中晚期,英国文化学者或致力于打造“昔日美好乡村”意象以同城市大众文化对抗,或将乡村视为愚昧落后渊薮,二者均将乡村和城市置于对立地位。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大众的重视,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一种迥异于英国“精英—大众”和“乡村—城市”二元模式的独特中国哲学。

在众多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思路最为赞赏、对英国城乡关系也剖析得最深刻的一位。威廉斯年少时在“左派图书俱乐部”读到埃德加·斯

^{*}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一般项目“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国智慧’文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1BWW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2-09-18

作者简介:徐淑丽,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诺的《红星照耀中国》(Edgar Snow, 1937)并深受启发,后来又从《毛泽东选集》等理论作品中获得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深刻理解。威廉斯说:“中国有句描述世界革命的名言:‘乡村’正在包围‘城市’。这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中,‘愚昧的乡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成为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1]威廉斯从中国实践中看到,乡村与城市同样蕴含着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工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城市繁荣并不能否定乡村潜力。由城乡关系出发,威廉斯逐渐摆脱了英国文化界盛行的一味贬抑或过度美化乡村生活的二元对立思维。

这种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摒弃,成为威廉斯剖析当时英国文化与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威廉斯不但批驳了F. R.利维斯(F. R. Leavis)等精英主义者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对立的看法,还将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驳上升为一种文化哲学。他反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二元划分,主张将文化归类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可能互相转化。另外,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也进行了重新阐释。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泾渭分明,被视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其实也具有作为“经济基础”的特征,所以他提出以“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来弥合“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裂隙。

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比威廉斯略晚一些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阵营的主力,他同威廉斯一样从中国乡村革命的成功中得到了理论启发。安德森在《后现代性的起源》中借评析美国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的诗歌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赞同。奥尔森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创作了长诗《翠鸟》(The Kingfishers, 1949),诗中将中国革命成功带来的曙光和柬埔寨翠鸟西飞意象并置,认为二者同样昭示着未来与希望。安德森对这种观点表示赞赏:“中国黎明的色彩和飞入西方的色彩反映的是同一地球轨道的光亮。”^[2]安德森看到,中国革命成功并非工人阶级从中心城市武装斗争的结果,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也并非通过简单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抗。安德森因此将中国革命看作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并因此认为中国革命具有后现代意义,而革命圣地延安

所在的陕西省也被安德森当作后现代的发源地。

安德森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背弃使其在文化批评中能够形成独特见解。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安德森指出马克思关于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断的不当之处。安德森发现,“在理论上把欧洲国家结构同亚洲国家结构相提并论和加以对照,是自马基雅维利和博丹以来的一个传统”^[3]。安德森对这种传统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具有独到的特征,笼统地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抹杀了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独特性。安德森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批判,本质上是在反抗对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粗暴的“西方—东方”二元划分。

同安德森一样,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中国道路蕴含的哲学思维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后现代意义。霍布斯鲍姆在谈到1955~1983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时提出:“现在有一些相互对立和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例如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统”^[4]。霍布斯鲍姆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意味着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多元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同甚至分歧。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世界格局就不能简单地划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国独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使霍布斯鲍姆捕捉到了世界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也是霍布斯鲍姆认为20世纪“趣味横生”^①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构建本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不断从中国处理城乡关系的思维中汲取智慧,并将这种智慧运用于其他领域的文化分析。很难断言他们是因为汲取了中国智慧才得以形成在文化领域的独特认识,还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认识才产生了对中国智慧的认同。但无论如何,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吸收使得他们具有超越英国本土局限的广阔视野和历史眼光。这种视野和眼光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许多观点得以经受住时间考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人民观:重视人民群众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发现,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中历来就有“重民本”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具体体现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极度关切。很多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初是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直

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该书生动刻画了革命区平等融洽的军民、干群关系,还引用了毛泽东对中国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故事里没有农民”“没有一个农民当过主角”^[5]。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对劳动人民的忽视必须得到改变。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文艺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批评有些文学创作者对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该讲话对底层民众的重视同样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印象深刻,并成为他们反复书写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文艺应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理论启发。雷蒙德·威廉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立场”与“党性”时,发现当时西方文化界对此存在着认识上的极度混乱。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注重社会与政治等“外部”因素,认为文学的政治倾向无法完全避免,文学必然体现“立场”与“党性”。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批评家强调结构和语言等“内部”因素,担心政治化的书写会为文学带来束缚甚至使之降格为政治宣传,反对文学的“立场”与“党性”。威廉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毛泽东的说法不无裨益”,“毛泽东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复强调是结合(integration):作家不仅要同大众的生活打成一片,而且要摆脱专业作家的观念,投身到各种新型的大众化(包括集体创作)的写作活动中去”^[7]。根据毛泽东的文艺观,“立场”和“党性”中蕴含的政治倾向不是教条和僵化的,而是通过与大众紧密相连而鲜活生动地体现出来。通过对毛泽东文艺观的书写,威廉斯为文学中的“立场”与“党性”获得了合法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中国智慧。

在对底层大众命运的关注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因此毛泽东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群体的格外重视。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对其中观点表示赞成:“农民毕竟是革命的创造者,不能把他们贬损为仅仅用于投资重工业发展的剩余价值的来源”^[8]。戴维·克雷格(David Craig)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撰写的导言中建议,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心怀成见的人“至少应该读

一读恩格斯的《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卡斯特罗的演说集”^[9]。《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普通劳动者生活的详细刻画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探索,使其被置于与恩格斯作品同样重要的地位,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密切团结劳动大众的事实,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反思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参照。自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逐渐进入低潮后,威廉斯等进步学者就开始反思英国共产党之不足。在以英国共产党员为群像的小说《忠诚》(Loyalty, 1985)中,威廉斯塑造了来自知识分子精英层的共产党领袖爱玛与诺曼等人,他们生活富足、听高雅音乐、拒绝与普通矿工家庭联姻。他们的疏离引起矿工伯特等社会主义者的不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裂痕。小说中的共产党员在听说1945年中苏红军在东北胜利会师后极为振奋,认为“这将改变世界历史”“当然会出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人民的世界”^[10]。威廉斯在小说中将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能创造“人民的世界”的中国,以此隐晦地批评英国共产党在团结底层劳动大众方面的欠缺。

相对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更为注重从当代中国人民观中汲取智慧。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蔓延时,中国举国上下齐心抗疫、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的做法令戴维·麦克莱伦印象深刻,他在接受我国学者专访时由衷地赞叹“贵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好”;他看到中国在解决气候和环保等关系到百姓生活与安全的问题上的优势,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地位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利”^[11]。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人民观的书写,在形式上仍然是对中国进行的“他塑”,但这种充满善意的分析为中国文化“自塑”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在不少西方国家因为种族和移民等问题面临社会撕裂的时代,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书写不但向西方展现了中国应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独到智慧,而且折射出一个充满创造性与活力的中国形象。

三、文化观:主张平等互鉴

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曾总

结过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吸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的原因与动机。汤普森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将视野投向英国之外,是因为“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所以“他们逐渐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12]。佩里·安德森后来补充说,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中期自由且有成效的发展,也需要同样程度甚至更为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13]。显然,汤普森与安德森等20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认识到:英国进步学者应当放眼世界,寻求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思路。当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敞开心扉吸收借鉴他国文化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化平等性的强调契合了他们的理论需求,因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得到持续关注。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共产党就开始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亲临中国并以切身体会向西方表述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文化理念。西方现代文明也强调“民主”“平等”,但是旅居中国的英国知识分子发现“平等”在中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并未限于抽象理念,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同甘共苦和精神生活中的以文艺为大众服务。这些旅居者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共产党因民主平等而迸发的蓬勃活力,随之出版了不少向西方介绍中国革命的书刊。他们对中国的介绍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媒体,将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展现,从而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平等意识奠定了基础。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了解中国的过程中,英国左派图书俱乐部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左派图书俱乐部是早期英国进步知识分子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镇,推出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书籍。在左派图书俱乐部推动、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者》(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6)一书中,作者斯图尔特·戈尔德(Stuart Gelder)深入苏区采访,详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平等待人、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的事实。戈尔德提到他与中国革命者接触时的感受:“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没有的慷慨。谁也无法在这些最卑微最贫困的人群面前感到自己的优越。”^[14]当时中国尚处于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沉暗夜,但苏区知识精英与劳动大众平等相待的态度,却让戈尔德看到了中国最终获胜的希望。左派图书俱乐部使英国读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全新的革命道路和思维理念,对文化平等的强调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与书写中国经验与智慧的重要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对平等精神的贯彻直观地表现在对农民的重视上,这种立场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文艺评论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重视乡村蕴含的巨大潜能,主张文艺以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源头活水、文艺为大众服务,表现出对乡村居民与乡村文化的极大尊重。一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中国实践为依据,对马克思“乡村生活的蠢行”之表述提出异议。威廉斯指出:“实际上在中国和古巴农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这种思维方式是欧洲的城市社会主义者所惯有的。”^[15] 麦克莱伦则指出,“鉴于西欧农民的保守态度,马克思不无沮丧地谈到‘乡村生活中的白痴状态’,并认为农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只能起一种从属作用”,但是“随着以农民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乡村的这种认识也就发生了改变^[16]。显然威廉斯和麦克莱伦都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蕴含的城乡平等理念有助于纠正马克思看待农民与乡村态度的偏颇。对中国文化中平等意识的吸收与借鉴,使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乡村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对中国文化平等理念予以认同的同时,还试图探寻其传统文化基因。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发现,中国古代文人能够有机会参与公共行为并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早期的平等意识。在处理国内外关系上,中国人很早就对文化平等的追求。霍布斯鲍姆因此提出:“中国文明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益良多。”^[17] 霍布斯鲍姆也对西方弱肉强食文化理念予以批评:“万一有什么国家不愿意跟先进世界(主要是英国)发生联系,坚船利炮也会使它们就范,中国和日本等世上最后的‘封闭’国家便是如此。”^[18] 霍布斯鲍姆对西方文化理念的批判,客观上从文化比较视角展现出中国文化平等意识的独特性和先进性。

不同文化、不同群体应当平等交流的理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一以贯之的内容,这种理念

在当代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格外重视。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9],此后又多次强调人类文明应平等地交流互鉴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Robert Griffiths)从文化比较视域指出这种中国理念的可贵之处:“美帝国主义承诺的和平与繁荣的‘新世界秩序’并未到来”,资本主义的种种行径反而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而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加强国际合作”的理念使“英国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为之高兴和自豪”^[20]。

中国人对文化平等的追求根植于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土壤中,所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文化平等理念的书写过程,也是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过程。对中国文化平等理念的了解,有利于西方民众在中西文化和经济交流时真正体会当代中国理念中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从而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思维,减少经济文化交流时的误解与摩擦。

结语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文化理念的解读,大多旨在寻找对英国社会问题具有启发作用的内容,所以难以全面展现中国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另外,他们常以西方文化术语考察中国理念,字里行间流露出西方学者的“他者”立场,因而并不能总是深入透彻地理解中国文化思想之要义。但总体而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态度吸收中国智慧以反观英国问题,对中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公正。近年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关注日增,与中国文化互动也愈加频繁。他们对中国的介绍和分析展现了中国智慧,推介了中国理念,提升了中国形象。他们关心的都是对中英均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或现实问题,而这也应该是我们在让中国文化顺利“走出去”时应该坚持的着力点。

注释:

①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周全译,中信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1]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3:410.

- [2] 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M].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 [3] 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48.
- [4] 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M].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75.
- [5]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王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93.
-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6-857.
- [7]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214-215.
- [8]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53.
- [9] 伊戈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89.
- [10] WILLIAMS RAYMOND. *Loyalty*[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105.
- [11] 麦克莱伦,方珏.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论反思与现实考量的链接点:戴维·麦克莱伦访谈录[J].现代哲学,2020(2):45-50.
- [12]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M].钱乘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993.
- [13] ANDERSON PERRY.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M]. London: Verso, 1980:148-149.
- [14] GELDER STUAR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M]. London: Victor Gillancz Ltd, 1946: xlii.
- [15]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37.
- [16]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
- [17]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M].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565.
- [18]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进程[M].梅俊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47.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 [20] 格里菲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成功经验与重要贡献[J].李鑫,石月,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1):18-23.

责任编辑:顾迎新